



社会转型与 大都市治理

——
国际视野下的广州经验

主 编 郑德涛
副主编 余耀胜

美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做法与思考 美国反腐败的主要经验及其启示 论中国公共产品民营化的发展前景 英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及面临的问题 论美国主要模式对广州社会法制转型的启示 欧盟与我国在公共管理模式上的比较研究 对美国社区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与借鉴 城市公共安全危机系统建设的思考 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与土地制度制度的探讨 对我国公共教育权力转移的思考 中美水资源管理的比较研究 中英津贴制度与收入制度比较研究美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做法与思考



社会转型与大都市治理

——国际视野下的广州经验

主 编 郑德涛 副主编 余耀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与大都市治理:国际视野下的广州经验/郑德涛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3

ISBN 978-7-80211-616-0

I. 社…

II. 郑…

III. ①大城市—城市管理:公共管理—经验—广州市

②大城市—城市管理:公共管理—研究—中国

IV. F299.2 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0923 号

社会转型与大都市治理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字 数 420 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 中山大学“开放式”教学 |



| 开学典礼后广州市委、中山大学领导、
任课教授和学员合影 |



| 学员代表向牛津大学赠送纪念品 |

| 学员在牛津大学参加篮球赛 |



| 牛津大学结业典礼合影 |





| 课间交流 |



| 师生互动 |

| 学员在牛津课堂发言 |



| 牛津市长接待学员的来访 |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

论政府干预	邱亿通/3
英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引发的思考	王 敏/20
科学发展的关键——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	陈秀源/29
借鉴英国经验 进一步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监督作用	陈文敏/44
论中国公共产品民营化的发展趋势	李 辛/51
英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对改善医院管理的启示	蒋少艾/61
对广州港口行政与公共管理的思考	区裕伟/71
欧盟与我国化妆品监管方式的比较研究	林勇胜/81

第二部分 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

借鉴英国人才管理经验 创建广州人才资源开发新模式 ...	何伍爱/101
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绩效评估制度的思考	邵 箭/113
中英律师职业准入制度比较研究	黄永东/122
从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看大学生的人格培养	张 强/130

第三部分 公共管理与经济发展

公共管理与社区自治——英国管理经验给广州市社区建设的 启示	凌妙英/143
从英国的经验看发展社区民间组织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 推动作用	陆志强/154
对英国社区卫生服务模式的思考与借鉴	张 立/167
广州市萝岗区村改居与农村城市化对策研究	成潘流/177

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与征地补偿制度的探讨——以广州为例

.....	黄金锋/185
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思考	陈家飞/192
增城市经济发展对策初探	李仲铨/202
借鉴先进理念和经验做强做大广州生态旅游	孙金龙/211
英国反腐败的主要经验及其启示	于绍文/223

第四部分 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

英国安全生产启示与广州安全生产对策	彭超盼/233
论英国志愿模式对广州志愿活动转型的启示	晏拥军/241
残疾人服务与服务机构:借鉴国外境外经验	梁左宜/253
城市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建设的思考	欧康寿/264
借鉴英国经验 推进广播电视数字化	刘 梅/278
我国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贺建华/288
借鉴英国经验完善广州市离休干部医疗保障机制	陈 敏/295
城市社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治理走向	王建设/305
谈谈加强广州市动物防疫工作的思路	周彩信/322

第五部分 公共管理创新

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思考	余向阳/337
创新区级政府管理	陈万雄/346
中英水资源管理的比较研究	黎 江/357
对我国公共教育权力转移的思考	王小强/364
领导艺术问题之我见	陈海如/373
英国国家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特点及启示	魏小平/380

编后语	/388
-----------	------

第一部分 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

论政府干预

广州市物价局副局长 邱亿通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政府职能因时空而变化。政府干预是政府职能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强化形式。在不同的国际环境、文化背景、制度条件、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干预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同。在现当代社会，政府干预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政府干预的不同力度和方式，不仅可能产生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而且可以决定现代化的成败。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如何运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既是其发展的难题，也是其赶超的契机。

一、国家干预与东方社会传统

国家干预是政府干预在国家层面上的高度体现。在高度集权的传统社会，政府干预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国家干预或政府干预是东方社会的独特传统，也是东方现代化区别于欧美现代化的明显特征。

在古代东方，由于其独特的生产方式——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成了不同于古代西欧各民族的国家干预方式。在古代东方，国家干预以国家专制这种极端的形式出现。

首先，古代亚细亚土地的国家所有制，是其国家专制的经济基础。古代亚细亚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国家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马克思认为，这是“了解东方的一把钥匙”。亚细亚的土地所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或者说是君主所有制。由于没有西欧自由小农的小块土地私有制，亚细亚社会也就缺乏像古代希腊、罗马社会里表现出来的那种独立的个体性。在东方，国家不仅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也是执行政治和经济职能的统治者。

其次，古代东方国家专制，也与亚细亚的村社经济和农业生产条件息息相关。亚细亚的村社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村社和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彼此独立生产。一方面，农业家庭和村社散处于全国各地；另一方面，

农业所需要的人工灌溉即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必须交给政府去管。正是这种独特的生产条件和村社制度，决定了东方国家权力在社会治理中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经济特征。在东方各国，农业生产的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府的好坏。在古代亚细亚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

关于东方国家专制存在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视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① 简言之，东方国家专制，本质上取决于东方社会独有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东方社会得出的结论。

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亚细亚形态下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很大程度上与其地理环境和治水工程的需要密切相关。这就是说，影响国家职能的因素，除了亚细亚的土地所有制、村社制度，地理环境的独特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否则便无法全面解释东方专制国家存在的事实。后来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声称他对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正是基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魏特夫把东方社会称为“治水社会”，认为“治水社会”这一名词较之传统名词更能恰当地表达东方社会制度的特点。在魏特夫看来，东方社会的治水工作是一种综合性的活动，一种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需要有条不紊的协作和“一体化的计划”，这就决定了东方社会政府的组织形式及其表现出来的权威。尽管我们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在总体上不能苟同，但魏特夫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却道出这样一个事实：相对于古代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的欧洲，东方国家的职能在不可遏制地膨胀，从而导致专制权力的出现。

建立在亚细亚独有农业生产方式之上的东方专制国家，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也正因为其国家权力是建立在落后的王权所有制、村社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和人工灌溉的基础上,生产方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上的专制主义国家也就注定要遭到历史的抛弃。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专制主义被历史淘汰的命运,不是善良的愿望可以挽救的。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它不能适应历史选择的根本原因。尽管在古代物质生产力落后、村落分散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专制国家对组织小农经济征服和利用自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专制主义国家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极大地阻碍了亚细亚社会的发展。国家的专制制约着社会结构和交往关系的发展,不利于打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国家凭借土地所有权把全社会的剩余产品据为己有,担负着像农业治水公共工程这样独特的社会经济职能,使分散的村落日复一日地重复简单的生产方式,家庭工业不能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自给自足而不依赖于市场,因而难以产生商品经济。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注定了它为西方先进文明所征服的命运。

当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世界历史形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峙局面。随着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世界各民族都进入了普遍交往之中,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渗透到亚细亚各地,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最终改变国家干预方式。

二、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

从本质上说,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是排斥国家和政府干预的,它要求完全的平等和自由。政府的作用如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如何,自从商品经济开始萌芽之后,就以商品和市场发展的程度为依据。16世纪商品经济刚刚萌芽,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完善,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扶植。这个时期作为思想代表的重商主义,强烈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重商主义主张国家采取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和关税保护政策,达到积累财富和扶持工场手工业商品出口的目的。到了18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革命的兴起,企业和个人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市场机制已逐渐完善,经济运行的调节靠的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机制,日益强大并站稳脚跟的资产阶级要求国家和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要求它只充当从事社会管理的“局外人”或“守夜人”角色。这个时期,自由放任主义开始出现。法国重农主义就认为,在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之后,社会完全可以依靠秩序自行运转,政府经济管理已显得没有多少必要。人们普遍认同的信条是:最好的政府就是

最小的政府。这个时期，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性思想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他认为，经济活动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无需政府干预。按照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政府职能主要是：保护国家和社会安全，不受外来入侵；设立司法机构，保护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提供社会公共品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看到，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是必要的。这一点，即使追随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英国经济学家穆勒也能意识到。在论述政府的职能时，他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观点，肯定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有的职能，包括：个人签订永久性契约时，政府应有规则加以干预；只能由代表来执行的事情，如联合股份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等，也要依靠国家的作用；对减少工厂劳动时间之类的事情，政府有必要实施法制干预等。1920年，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经济职能。他认为，完全竞争虽然有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仍会出现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背离的问题，这说明仅靠自由竞争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必须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政府通过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可以消除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背离的情形。虽然庇古仍视私人经济的自由竞争为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基本机制，但他已意识到这一机制存在局限，这个局限需要政府干预来填补。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后来发展成为新福利经济学，成为国家垄断主义的政策理论依据。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人们已清楚地看到，在经济活动中，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存在失灵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即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理论应运而生，成为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必然产物，导致失业和社会分配不公，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他认为要消除失业和分配不公，政府就必须通过以下手段实行经济干预：（1）增加消费以提高消费品的需求，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2）通过税收政策，实行收入再分配，以增加消费支出；（3）通过货币政策，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资；（4）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弥补投资不足。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下，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日益加强。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政府不仅要为市场经济制定“游戏规则”，建立和维护市场竞争制度，而且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经济调节手段，干预调节经济运行过程，保

持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均衡；不仅要调节市场的分配结果，克服社会分配不公，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而且还要利用政府的力量，开展对外经济扩张，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政府的经济功能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两大派别，即“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又称“美国凯恩斯主义”、“英国剑桥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汉森、萨缪尔森、托宾等。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体系和古典的微观理论体系相结合，将凯恩斯强调的财政政策和凯恩斯主义注重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形成“混合经济”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有三个作用，即效率、平等和稳定。新剑桥学派以收入分配的结构分析作为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认为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对收入分配进行干预，克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严重的“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干预政策已无能为力，出现了一股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重新认识和界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货币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弗莱堡学派和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主张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是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不是通过经济政策来干预经济活动，不能用人为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以詹姆斯·M. 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之所以需要政府，是为了消除经济的外部性和公用品生产的需要，以保证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个人福利；弗莱堡学派，也称德国新自由主义，提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主张政府有限干预原则，即只对市场经济进行有限的干预和价值监督，以保证企业和个人平等自由的竞争，就像在足球比赛中，政府仅仅作为裁判员维持比赛的秩序；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彻底的经济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认为失业和通胀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市场机制是完善的，用不着国家去实行收入再分配或福利措施，在理论上公开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相对立。

由此看来，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的论战，始终围绕着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而展开，在论战中认识逐渐深化。应该指出的是，自由主义并非反对一切国家干预政策，并非彻底否定政府具有一定的经济职能；政府干预主义也并非完全排斥经济自由而主张干预一切。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在经济理论上，新自由主义重新抬头；在实

践上,有些国家的政府,如美、英,也从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改为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调节。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发展来看,当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时,人们更希望接受自由主义观点,减少政府干预;当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时,人们会主张从政府干预中得到经济支持。总的来说,由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履行其经济职能时,通常都限定在私有制所允许的限度内。以市场自发调节机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本质要求,政府行使经济职能,无论如何不能动摇这一基础,政府的经济职能必须能够较好地适应和促进这种市场经济的运行,除非经济危机等非经常性情形的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几百年来一直为相当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所追捧并发扬光大的原因。即使凯恩斯主义极力强调政府干预作用,也没有完全扭转这种状况。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抬头,政府经济职能淡化,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是根深蒂固的。

三、后发国家现代化与政府干预

市场经济的发展表明,市场机制并不能代替政府的作用。但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如何界定,它在市场经济不同的环境下如何发挥不同的作用,就成为永恒的、争论不休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特点,加上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国家和政府在各国市场经济中表现出来的职能作用也不尽相同,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同时也给后发国家留下探索和选择的空间。

市场经济是一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不可超越的历史经济形态。许多后发国家落后的原因,往往正是由于忽视或错过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市场经济,同样要面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职能问题。而且,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由于“后发”而注定了现代化的特殊性,对政府的经济职能必须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政府的作用不仅要像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弥补市场的失灵,而且还面临着追赶、超越发达国家的任务。也就是说,后发国家要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先发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就必须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这也是现代化对后发国家政府提出的特殊要求。

市场经济是一种世界经济。面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格局,后

发国家要打破这一格局，跻身于现代化国家之列，其面临的困难往往比先发达国家要大得多。加上后发国家存在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这些国家之所以落后，与这种复杂的国内环境是分不开。因此，一般而论，后发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任务更重，它必须更好地履行自身的职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后发国家又是市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市场机制十分不完善，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是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因此，后发国家现代化，必然面临着十分矛盾的选择：一方面，它要大力培育和完善的机制，任由市场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它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争取依靠政府的有效干预在短时间内使经济腾飞，赶超发达国家。实践证明，成功的后发现代化，就是善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有效干预，以缩短走向成熟市场经济的时间。

然而，不成功的后发现代化，也往往与政府职能的不恰当发挥，特别是将政府干预不适当地加以夸大有关。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看，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明显特殊性是，政府为了赶超先发展国家，实现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制度安排相对而言更加激进，政府的作用也更加明显。但是，同时也更容易形成政府扶植下的垄断生产集团，到最后往往又会由于市场的不完善而导致效率的下降，有些还会成为政府的沉重包袱。关于这一点，亨廷顿说得更严重，他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忽视甚至否认市场主体的平等权利，以政府干预之名行垄断、专制之实，会导致不良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亨廷顿认同权威政府，但不认同威权政府。政府不能无所作为，但也不能为所欲为。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后发国家现代化也存在有利因素，那就是它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善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先发达国家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逐步认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其间也有过不少的失误和教训。后发国家可以吸收其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扬弃别国的发展模式，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避免不应有的失误，使后发国家以更少的代价和更短的时间，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同时后发国家还可以利用先发国家的已有技术、资本，减少研究和开发成本，发展本国主导产业；可以利用与先导国的相对优势与劣势关系，发展国际分工和贸易，加速资本积累等。要把这些有利因素变成现实，就有赖于政府的强有力作用。政府必须正确地认识到作为后进国所面临的优势与劣势，扬长避短，恰如其分地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一般来说，后发国家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 加快工业化进程。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上长期落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缺乏独立的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在经济上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国。为了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为了完成不同于资本主义先发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集中起巨额的社会资本,就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对那些周期长、见效慢而又对经济起飞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生产部门,必须由国家、政府集中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工业化初期,以更短的时间建立起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政府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工业化发展的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运用社会经营资本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等等,都需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在对外贸易上,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政府必须制定有效的对外开放和贸易保护政策,帮助本土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经验表明,没有政府的推动作用,发展中国家很难单独依靠市场的作用自动完成工业化发展目标,达到经济腾飞和赶超先发国家的目的。

(二)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稳定的经济环境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波动是困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难题,历史上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使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倒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稳定的经济环境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在时间上晚起步,应尽可能减少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波动,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才有可能尽快赶上或超过先走一步的发达国家。当然,经济波动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这就需要发挥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进行总量调节。经济发生波动时,政府可以根据市场动态和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熨平波动。实际上,剧烈的经济波动一方面说明政府宏观调控乏力,另一方面又证明了正确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从体制创新上避免或减轻经济波动,找到赶超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快车道”。

(三) 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市场经济是一切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发展中国家不能绕过市场经济搞现代化,但却可以寻找更为有效的发展途径。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借助政府职能的合理运用,用更短的时间建立起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当然,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内在规律,政府职能的发挥只能遵循这种规律,必须采取适应市场规律的方式。但是,如果像老牌工业国家那样,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发育,不仅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追赶就会成为空话。事实和经验证明,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扶助,催促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尽快形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政府通过制定法规,规范市场“游戏